

2022 河北文坛回眸(二)

重新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意义

□ 杪 楞

1 对历史的现实阐释

年度内河北散文的题材选择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但不限于对历史人物、事件、乡村生活和时代主旋律的书写。在可谓洋洋大观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较为清晰的主脉,即贴近现实生活和彰显历史意识的书写备受重视,而后者最为突出。这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河北文学传统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甚至远追中国抒情散文中的“言志”传统。精神追求与“燕赵风骨”一脉相承。

以刘江滨为例,最近几年他迅速完成了从媒体人向散文家的华丽转身,成为文坛上散文领域声名鹊起的作家。他的多篇厚积薄发之作尽管以现实为鹄的,却多从历史起笔,始终在长长的传统背影中行迹。《有个村庄名诗经》(《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12月1日)从地名开始追述《诗经》的流变史,进而凭吊在《诗经》滥觞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毛萸。文中写到在毛萸墓前的一个动作,昭示了他对待传统的虔敬态度:“我双手作揖,深深向毛公拜了三拜。”将此置于结尾对中国乡村的想象之前,意欲建构的是传统与未来之间必然存在的因果关系。另一篇作品《槐巷巷》(《雨花》2022年第12期)写法与此几近相同,通过梳理槐树这种北方常见树种与人民生活之间的紧密历史关系,从而将它的栽植史转换为民族精神形成的文化史,并在现实中铺展开所寄托的情感追求与未来图景,意欲证明的仍然是历史指引未来的文化定理。

厚重的历史情结弥漫在众多河北散文作者的头脑里,过去的经纬线成为确认当下的坐标系。郭文锁的《三个人的瓮铃》(《美文》2022年7月上)藉由一次刻意为之的进山之旅,在回望人生旅程的同时,由朝拜女娲、山神和前行者再到缅怀抗日先烈,始终保持了对传统的敬仰。路军的《草木絮语》(《北方文学》2022年第12期)以乡村常见的果蔬与花草为书写对象,但亦不忘从典籍中爬梳它们的舶来史和附着其上的文化意蕴。与此相类,芷妍的游记《游园惊梦》(《散文选刊》原创版2022年第1期)在游览风景中叩听藏匿在古迹中的历史足音;刘亚荣的《金山风物记》(《莲蓬》2022年第4期)在饮食菜肴、民间工艺中钩沉江南独特的地域传统文化;绿窗的《次第春风到草庐》(《民族文学》2022年第5期)在可触摸的家族故事中展现对非遗剪纸艺术的传承,将“我”与奶奶和父母之间的情感牵系与对传统文化的爱与责任融为一体,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张力使叙述产生了深沉醇厚的韵味。史丽娜的《时光里的滹沱河》(《美文》2022年4月上)选取滹沱河下游的断桥、河旁两个村落以及上游的阿育王塔为叙述的焦点,发掘被覆在自然风光和生活表象之下的文化意蕴,在将空间时间化的同时,诸如“滹沱河这无法定论的一笔,定睛看来,却是藏了诸多智慧”这样充满情感色彩的表达,仍然保持了对历史传统足够的赞许与崇敬。

2 地域认同与反思传统

与河北文化传统的衔接,通过对“燕赵风骨”这一地域性格的认同直接表现出来,尤其体现在写人的作品中。路军的《清风明月》(《火花》2022年第2期)主人公是苏轼,苏轼的仕途从未安定,但作者独钟其与王安石、章惇、曾肇、晁秀等的交往,并非他们中间有多少跌宕的传奇故事,而是“清风明月”般的情谊品质。重情重义、宽容磊落、浩然达观的襟怀,对应的正是飘荡在燕赵历史上空的“慷慨悲歌”。这已然成为河北散文家选定书写对象的一条标准,写古人如此,写今人亦如此。尧山壁的《忆顾随先生》(《光明日报》2022年1月21日)历数了先生的渊博学问和讲课神采,回忆其讲授领袖诗词时对豪放气势和英



综观2022年度内的河北散文创作,携带着丰沛情感和炽热温度的书写遍布文学期刊、报纸副刊以及网络媒体,它们绚丽多姿、数量众多,多路径抵达生活和人性的深处,呈现着写作者自由奔放的主观意志。

从文体范式上论,当下的散文是文类细分的结果。尤其是经历现代化转型以后,它在与“韵文”相对的位置上不仅剔除了小说,也剔除了论说文、说明文等实用性文体,甚至也有将随笔排斥在外的趋势。从“文化大散文”开始,在文学意义上将自己变得更加纯粹而深刻似乎是散文潜藏的野心——吊诡的是,在它自身“内卷”的同时,伴随新诗不再讲究押韵,作为“对立面”的“韵文”在现代文体序列中已不见踪影。因为缺失了“对手”,遽然觉得散文的“文体自觉”仿佛陷入迷茫——它反倒因此获得了拯救:在扁平化而又蕴含创造性的日常生活中,任何规范和标准都成为桎梏,“打破它”是大众写作的必然选择——这让本已浩瀚的散文创作场域愈加宽阔。

在被新媒体重塑的河北文学现场中,散文值得重视。一方面,设若没有这些散文,何以在审美意义上以最直接的方式确认自身的主体性及与时代的关系?另一方面,当以地域视角来观察这些作品时,会发现他们普遍暗含着对“燕赵性”的张扬,这也让这种观察更具合理性和必要性。

雄境界的赞叹,并用“牛的耐力,龙马精神,鞠躬尽瘁,灯油熬尽”定评先生的一生,可谓具有了一种为了学问和学生而牺牲自己的“侠义”精神;冯立新的《老庄》(《散文选刊》2022年1月下)精于对事件的记述和场景的白描,但真正让人物立起来的则是合乎其职业道德和形象的勇敢无畏与江湖气。韩愈《送董邵南序》开头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到了《隋书·地理志》则具体化为“悲歌慷慨”“俗重气侠”“自古言勇敢者,皆出幽

燕”。其实细想,这一地方性格的形成并非天然,而是历史留给因自然条件艰苦、政治势力割据而祸乱不断、难得太平生活的北方一笔不菲的精神财富——它绝非独属于燕赵,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血脉的重要内蕴。

信奉历史文化传统,是河北散文重要的主题取向。传统成为一种信仰,对当下的、特定的人和事产生了可见的影响,日常生活也因此被高度意义化。我们犹如对待新生物物种般热情且虔诚地对待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成为现实的某种表现形式。散文是保留了浪漫主义表达功能的文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宽容理性。在对传统的书写中,陆旭辉的《人心的重量》(《散文》2022年第12期)以其独特的历史观,成为年度内值得关注和讨论的作品之一。与众多沿袭习惯性视角进行的观察不同,作者对“关羽成圣”这一文化现象的思考建立在思想史的基础上,通过“关圣崇拜”揭示社会信仰产生的奥秘。作者运用资料的丰富,论说之翔实使文章兼具史学价值。刘江滨的《人性的幽暗》(《散文百家》2022年第2期)与他的前述两篇作品不同,通过讲述魏忠贤的一生来揭露“人性的幽暗”,背后的思想逻辑建立在对封建制度下身体政治学的批判之上,而对人性和命运的喟叹又使之保持了散文叙事的感情温度。

3 时代精神中的个体情感

直面现实的书写在散文天平的另一端,就其风格和所折射出的思想而言有着不同的向度。一类是对时代精神的高度认同,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伦理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冯小军这几年专事生态散文创作,《在塞罕坝打鸟》(《文艺报》2022年9月4日)在向公众普及林业知识的同时讴歌林业工人的奉献精神;《被移栽的命运》(《北方文学》2022年第6期)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讲述大树从山野被移栽后遭受的伤害,对破坏自然的行径予以无情批判。绿窗的《愤怒的野猪》(《黄河文学》2022年第4期)也可归于生态写作的序列中,在探讨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时,野猪咬死牲畜的故事则暗合了“善善恶报”的朴素伦理。虽然的《冀中物语》(《文艺报》2022年11月4日)写乡间田地里的事物,不经意间表露着对传统乡村自然生活的向往。宁雨的《滹沱河笔记》(《散文百家》2022年第10期)写人与景的“双向奔赴”,结尾的“滹沱河赐福”指向的是环保的力量。梅会林的《洛河,从我家乡流过》(《大江文艺》2022年第7期)虽回溯历史,但意在通过新旧对比展现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王继颖的《滇池候鸟》(《散文百家》2022年第11期)由滇池候鸟写到为了国家建设而南北迁徙的亲友,语间流淌着暖意与敬意。心盈的《家门》(《青少年文学》2022年第5期)以“门”的升级换代为线索,将个人的回忆放在雄安新区建设的大背景下,个人生活变迁中感受时代进步的主旋律。刘世芬的《车轱辘》(《都市》2022年第10期)从学车写与之相关的路、导航和桥,以此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这些作品虽凭借个体真切而细微的观感发现主题,但采取的是将生活事件和情感纳入观念序列中,对主流价值和集体情感进行审美表达的方法。其过程与将历史现实化的方向相反,所做的是将现实历史化的努力。

如果将历史和现实看作结构化的社会构成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在另一类作品中,身在现场的切肤之感,以及命运与现实的博弈则是着重表达的主题。四四的两篇作品用绵密的叙事挤压郁积的情感,增强了现实的不可把握性,《你的馈赠》(《湖南文学》2022年第12期)写自己在失败了的感情和婚姻中的感触与“收获”;《此心不

安》(《鹿鸣》2022年第9期)则由故乡房屋和农民生活的变化映射出乡村的变迁。齐未儿的《渔村纪事》(《四川文学》2022年第8期)从娓娓道来的“我家”到清伯一家的生活,渔事编织起的“网”让人心安,却也成为难以挣脱的命运之网。陆旭辉的《跨过万水千山》(《散文百家》2022年第11期)以旁观者的视角写一位身有残疾但心怀大志的青年,“命运的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确定的事。宁雨的《从一颗蘑菇出发》(《西部》2022年第4期)由与蘑菇相伴的人生记忆,深入到对女性的命运探究中。刘亚荣的《小婢与仙人球》(《牡丹》2022年第7期)以仙人球喻写小婢的生活,在乡村伦理中扼叹人性之变。心盈的《火苗花》(《散文百家》2022年第10期)以真挚饱满的情感回忆成长中的苦难经历,在至亲亡故的哀恸中流露出的倔强与乐观令人泪目。刘云芳的《肇事者》(《满族文学》2022年第4期)在情、理、法三者的纠缠中写叔叔遭遇车祸后的无助与无奈,显示了人生中的荒诞一面;而《风中的修辞》(《散文》2022年第3期)写亲情,通过对现实中身在何处的追问,让对故乡和亲人的回忆变得更加温暖。

4 被拆解的日常与“史传”传统

散文要在日常中发现生活的意义,但日常往往又表现为难以把控的碎片化。对脱离生活逻辑和世界秩序的表达,在散文叙事中体现为对线性结构的拆解。刘萌萌的《母亲的丝绸之路》(《当代人》2022年第10期)将女性对命运的挑战与接纳收拢在母亲的一次新疆之行中,对一条裙子的向往,以及“用来过日子”的我家与“用来做梦”的姨妈家的生活对比中,掩映着女性确认自我的内心悸动,情节不断在停顿与回环中被重新接起;《时间里的钟表》(《百花洲》2022年第5期)则从流逝的时间中,寻找日常生活留在全家人生命中的隐秘印记。齐未儿的《声音相闻》(《股东文学》2022年第11期)对准市井,在左邻右舍鸡零狗碎的生活片段中,揭开的却是人间烟火的奥秘。“无结构”感更表现在以下几篇中:庞永力的《辛丑随笔》(《散文》2022年第5期)真正是“随记”,既有日常所见所得,也有阅读所思所悟,其中有几则是寓言式的写法;王海燕的《早晨》(《散文百家》2022年第9期)记录某个早晨的行动与感悟,似乎要将散文的“散”发挥到极致。

从对传统的信仰,到对生活点滴和情感流泻的记录,再到叙述中灵活的结构选择,我们能够在现实缝隙中看到一抹暖融融的浪漫主义微光,这或许是散文最大的价值。其实,河北散文对历史的重视本身就就是一种文化:作者们念念不忘中国古典的“史传”传统,自认散文在生活中、世俗化的属性之上还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齐未儿在《声音相闻》开头的话颇有典型性:“我觉得我有义务记录下那些普通人朴素的日常,记录下我眼里看到的每个人的喜怒哀乐,记录下平凡如蝼蚁的人们的苦难幸福与烟火微光。我相信无数微末的个人史,就像是最小的样本,放到一起,会折射一个时代的家国情。”

放宽视野看,散文的确践行着这样的抱负,也作出了这样的贡献。当然,尽管风格不同,但只要能够表达作者可辨识的独特审美、情感和思想,就是值得鼓励的写作。但是,上述某些作品也提示写作者,需要力避散文的“报告文学化”,尤其是试图用“宏大叙事”来处理社会重大题材的写作,这与散文的文体追求是相悖的。报告文学本来是散文的一种,但假如把散文写成了报告文学的一种,必将是文体的退化。



□ 梁 勇

大河南北,是中国最古老的商业发祥地。河北的商业、商帮、商人、商事,在中国商业史上书写过独具风采的篇章。最近,看到河北经贸大学曹琳博士的《传统冀商商业经营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感觉耳目一新,对研究和传播冀商历史颇有一些启发借鉴意义。

这部专著对古代河北的商事和商帮做了简述,对清代以来河北商帮做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尤其是对冀商为近代工商业发展作出的贡献浓墨重彩地给予了阐述。对开发东北的“老伙帮”,沟通蒙俄的“张库帮”,亦商亦文的“冀州帮”,惠济京畿的“冀中帮”,以及“天津帮”“武安帮”,安国药商、辛集皮毛商、高阳布商,还有其中涌现出的代表性人物给予精准展示。如刘新亭、武百祥、孙秀三等闻名东北的实业家,建立了黑龙江规模最大的民族工商业“同记”;东北地区颇具规模的民族企业“益发合”;孙殿起、陈抗等古旧书业巨贾,发祥了文墨飘香的老字号,如“全聚德”“东来顺”“内联升”“金鸡鞋油”“马应龙眼药”等,都是由冀商所开创。辛集皮毛、安国药材、保定酱菜、高阳棉布、清河羊绒、安平丝网、顺平内衣等,莫不是名满天下。

这部书作为研究冀商的专著,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精神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在篇章结构谋划、史料权威性和独特性以及冀商经营智慧与精神的归纳提炼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首先,本书对冀商整体面貌做了鸟瞰式概述,从河北的历史沿革到冀商成长与发展的自然和人文社会背景,简洁勾勒了古代冀商的历史概貌,重点展现清代以来冀商商帮的人文风貌,并对冀商的经营管理、商业形象、社会关怀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文笔流畅,便于人们阅读。

其次,本书非常重视一手史料的掌握与运用,得益于毕志夫先生与河北经贸大学合作创办的“中国发票博物馆”,馆内藏有中国目前最丰富的冀商发票实物。曹琳博士是这所博物馆筹建的亲历者,所以,这部书收录了文献史志与现存冀商经济往来的老发票等第一手文物资料,对研究冀商历史具有权威性、独特性价值,对中国发票博物馆藏品的弘扬、利用也是一次有益探索。

再次,本书理性运用比较思维,对冀商商帮群体的经营智慧与商业风格做了归纳,展示了他们先进的经营理念。譬如在市场开拓领域,论述了冀商敢闯敢拼,奠定开发东北、沟通蒙俄、惠济京津、物流天下之开阔格局;在经营策略上,善于观察供求形势,抓住时机,主动寻求技术进步,精益求精;在商品购销上,利用先进技术和渠道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又率先利用印刷品、广告牌等视听手段进行商品宣传;在组织管理上,资本组织形式由独资、合伙制向股份制改进,推动了旧式商号向近代企业的转型。他们还实行“薪金分工”“入股分红”等制度,增加劳动者收入,注重福利待遇的完善,并通过职业技能训练和建立专门学校,培养后备人才,有效促进了事业的长久发展。在经营中,他们将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奉为圭臬,注重顾客权益,不仅坚持物美价廉、工精料细,还首创“言不二价”“明码标价”,以诚实、信用做利器,童叟无欺。

最后,本书还通过冀商主要商帮代表性人物的生平经历,归纳提炼了冀商群体人文品质的精神特质,尤为可贵。燕赵自古多豪侠仁义之士,在冀商身上,也拥有鲜明的人文情怀。他们始终怀有不能“任中国商业落后于洋商”的自强精神,大多数具有坚定民族自尊和爱国之心,理性把握中华民族人性光辉的义利观,艰苦创业、克勤克俭是他们的底色,讲求信誉、以义取利是他们成功的根基。此外,他们投资办学助教的文化自觉,也在这部书中得到精彩的展现。

作者满怀学者的历史责任感,以一定篇幅阐释冀商智慧与精神的当代意义,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历史在不断发展,但冀商群体的经营智慧和精神,依然是丰富的宝藏。他们具有勤俭坚忍、诚信尚义、勇于创新、锐意进取、唯才是举、好学重教、扶危济困等优秀的人文品质,为推动民族经济发展而奋发图强、振兴家邦的信念与热情,是燕赵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入挖掘、整理并努力弘扬冀商精神,对于营造创新、进取的社会氛围,增强诚信重义的社会意识,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

传统冀商智慧与精神研究的有益探索

把一层层日子剥成诗行 ——读周永君的诗

□ 刘万庆

周永君笔名柳如烟,是“石痴”也是“诗痴”。2008年,我便读到了他数十首石头诗作:“用时间雕刀塑像,塑成后复归于时间……永恒的夜亦永恒的昼,塑一身洁白,那盲夜便不再是盲夜。”(《钟乳石》)“又一个宇宙叛逆者/投奔大地,而满天的星星/瞪圆了眼睛,在寻找谁呢?”(《陨石》)“以树的形象,兀立/以石的形象,沉思……荣与枯,生与死/都会限成一种缘分。”(《硅化木》)如此林林总总且形形色色的石头,在他的笔下,不仅具有石性,而且赋予了人性;不仅对标在自然空间的位置,而且展现了在时间长河中的灵动;不仅有了温

度和情感,而且有了使命与担当。就这样,周永君因了诗歌主题的构思与锤炼,使冷冰冰的石头获得了人文意义上的新生,又因对石头前世今生的思考,使诗情诗意醇厚而深邃。

虽不能确定石与诗在他心目中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但几乎能确认的,是他痴心不改的“抚摸”,遂使石头有了文化的包裹。其力作《抚摸汉字》,在他为诗为文的追求中都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在殷墟,我曾诅咒过黄土,埋掉了一个朝代的基业、城池、欢乐与悲伤。月圆月亏,只有或疾或缓的风,低吟谁也听不懂的历史。”他继而联想,是盘庚的“宏图大业在这里施展,也把他的理想哈赠给子孙”,是周天子的“一把炬火,使它成了

商之废墟。但‘商’之玄鸟,化作浴火的凤凰,待到涅槃时,已然过了千年”。因之,他又“寄情黄土,是它将远古的文明,妥妥掩藏起来,在彻底体验夜的沉味之后,等待后人,投一缕阳光”,照见“带着祖先手温的甲骨文”,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字的根”。作别殷墟,他依然“走不出殷墟的遐想”,因为“汉字,有如太阳升起的那一抹红,已然流入中华民族的动脉、静脉,灌溉着全人类的瞳孔”。这是怎样一种至诚至爱的体验与情怀,让我们对对方方正正的汉字肃然起敬,让敬爱之情油然而生。

诗意的高度委实是诗人视野与思想的高度。走进新时代,诗人周永君的目光和灵感投向了《贾湖骨笛》,“给世界一个音

符,世界还你一首天籁”;投向《悬棺》,“生前活在低处,死后把魂魄高高举过头顶”;投向《河姆渡》,“船行走,不能同时靠向两个渡口。风吹我,如同先人轻拍我的肩头”;投向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借助梦的枝椏,灵魂能摸到雨后的彩虹”;投向移山的《愚公》,“眼前有山,心中无山……身的磨盘转动,榨出汗水里的盐……没有一座山是双脚的禁地,心,扶着肉身走过一生、走过子子孙孙”。

近年他写诗少了,宁缺毋滥,在质量上力求自我能及的极致。遂问他:“既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你眼下正构思或正‘抚摸’的诗作是什么?”他答:“三星堆。我的诗章,就是要将一层层的日子剥成诗行。”